

◇译者序◇ 员

译者序

——学会多视角地重新探索国际关系理论

摇摇

一、詹姆斯·德·代元其人及学术生涯

詹姆斯·德·代元(~~James D. Dyer~~)是布朗大学沃特森学院的国际关系学教授、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政治学教授。他先后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南加州大学(~~UCLA~~)、加德纳—兰开斯特州立监狱学院等一流院校,并且也是麻省理工学院(~~MIT~~)、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的高级访问学者。~~1971—1975~~年,他当选为新泽西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

~~1971~~年,德·代元就学于加拿大的麦基尔大学,获得政治学和历史学学士学位,在此期间受到汉迪·布尔教授研究国际关系方法的影响。后来,德·代元获得牛津大学罗得斯(~~Rhodes~~)奖学金,并在牛津大学获得国际关系专业的硕士、博士学位。~~1976~~年、~~1978~~年,在福特基金会、麦克阿瑟基金会的资助下,德·代元教授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圣·安东尼学院进行有关战争博弈、虚拟战争(~~computer simulation~~)的研究。最近一段时间,经福特基金会批准,德·代元教授在布朗大学组织了一场“~~国际战争再思~~”的研讨会,并负责一项“信息、技术、战争与和平”的研究课题(简称 ~~国际战争再思~~项目)。目前,他的研究兴趣包括:国际关系与社会理论,战争与外

圆◇国际关系理论批判◇

交理念中的信息技术和新传媒。

德·代元教授的其他著作有:《有效战争:构筑军工—传媒娱乐网》(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论外交:一种远离西方的系谱学》(1997年)、《维瑞利(灾难)读本》(1998年)、《反对外交:间谍、恐怖、速度与战争》(1999年)、《国际文本间关系:世界政治的后现代读物》(与迈克尔·夏皮洛、约瑟琳·霍夫曼合编,1999年)、《国际文本间关系:世界政治中知识和实践的界限》(与夏皮洛合编,1999年)。而且,他写了大量国际关系方面的文章,分别发表在《国际关系研究评论》、《国际关系研究季刊》、《千禧年》、《抉择》、《文化价值观》、《社会理论》等杂志上。近来,受《连线》、《华盛顿季刊》、《民族》、《理论》、《文化与社会》以及《华尔街日报》与《时代》的邀请,他写了一些有关技术、政治以及新传媒等方面问题的文章。

二、本书内容的框架

这本论文集包括五部分,总共收集了150篇风格不同的学术论文,既包括现实主义学派内部主要代表人物(如马丁·怀特、汉斯·摩根索等人)的作品,也包括其他“批判理论家”(如亚历山大·温特、琼·贝思克·爱尔兰希坦等人)对所谓不言自明的定理背后的分歧性、模糊性重新进行解释的作品。

在第1章《导言:批判性探索》中,德·代元明确提出,既然国际关系中并没有一个天然的中心,而是处于一种人们所熟知的无政府状态之中,那么这本论文集的主要内容就是以经典现实主义作为“模板”,来探索集体身份与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方式、含义,以此来说明边缘性的理论区别究竟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

第一部分《理论与传统》包括三篇经典性文章,基本涵盖了传

统理论的主要关注点和理论建构。在第 圆章《为什么没有国际关系理论》中,马丁·怀特教授认为,既然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思考国家构成的社会、民族大家庭或国际共同体的传统,那么,圆世纪以前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特征就不仅表现为内容的匮乏,也表现为理性与道德的贫困。另外,由于国际关系理论不得不使用政治理论和法律的语言,最终“涉及生与死、国家存亡的这一根本性体验”,因此,国际关系理论只能冠之以历史哲学的称谓(国际政治学等同于历史阐释学 匀),并且具有滑向神义学()的倾向。在第 猿章《理论的理性与政治功能》中,汉斯·摩根索对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态度要比怀特乐观得多,并认为:“国际政治是事件周期性重复发生的领域。”针对风靡一时的理论抽象理性主义(行为科学倾向)与进步主义的理论(理想主义),摩根索进行了强烈的批评,进而讨论了国际政治理论的两种功用。在第 源章《汉斯·摩根索的政治现实主义原则:女性主义的再阐释》中,援安·蒂克纳首先分析了汉斯·摩根索的政治现实主义六原则根植于男性观点的传统(),并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对“权力”、“安全”两个核心概念进行了再界定。然后,在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蒂克纳重新阐释了政治现实主义六原则。

第二部分《无政府状态与主权》开始与经典现实主义进行新的对话,并对其进行重构。在第 缘章《国际关系中的社会与无政府状态》中,汉迪·布尔对“国际关系中的无政府状态与社会不相容”的观点进行了检验。而且,布尔对国内类比的局限性做出了大量的论证,并由此确立国际关系的自主性。在第 远章《无政府状态下的强权:理论、主权与全球生活的治理》中,理查德·阿什利认真思考了汉迪·布尔提出的观点,并恢复了“无政府状态这一事实”以及人们所强加的“国内类比”这一权威式的神话等话题。然后,阿什利对这些话题做出了后结构主义的分析,并对全球治理

中的几个议题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在第 7 章《无政府状态是由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中，亚历山大·温特的主要目的就是发展一种源于结构主义、社会学的建构主义观点。为此，温特批判性地检验了新现实主义的主张、观点，形成了一种关于自助与权力政治怎样在无政府状态下被社会得以建构起来的实证主义观点。在此基础上，温特研究了在无政府状态下改变认同与利益的几种方法。

第三部分《学科与权力》包含有关国际关系学科中权力和国家这些主题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从不同方面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历史性评论，对现实主义理论的持久性做出了社会学的解释，并对这门学科成长的前提条件进行了深刻思考。在第 8 章《1945—1992 年的国际政治理论》中，汉迪·布尔坚持历史方法是理解国际关系的基本方法，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三次发展浪潮进行了回顾，并总结了这门学科的发展历程。在第 9 章《美国社会科学：国际关系学》中，斯坦利·霍夫曼分析了使国际关系学仅仅在美国取得发展的几种因素，并且通过对这门学科的客观评价，指出了国际关系学所具有的“美国化”特征。在第 10 章《世界秩序的辩证法》中，海沃德·阿尔克和托马斯·比尔斯特克两位作者认为，国际关系学应是一门全球性的“交叉学科”，只有采用辩证的、启发式方法，才能深刻地研究国际关系领域中一些自相矛盾的问题。而且，他们以肯尼思·沃尔兹的理论文本作为重要的“个案”来研究，检验了目前在美国国际关系的教学中存在的狭隘主义（行为主义）倾向，并指出了未来进行研究的几项指导性原则。

在第四部分《理性与历史》中，虽然接下来的主题是学科上的实践和压力究竟如何形成了国际关系学的理论探索，但是该部分使理论的争论继续向前推进，以至于包括了认识论、本体论以及伦

理学这些新近出现的重要问题。在第 15 章《研究国际制度的两种方法》中,罗伯特·基欧汉倡导只有将研究国际制度的理性主义与反映论两种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设计出多维度的研究战略,才能使经验性工作不会相应地受到损失。在第 16 章《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历史与结构》中,罗布·沃尔克对基欧汉所提出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了回应,并且认为,永久性(非建构性)结构主义(特别是国际制度论和结构现实主义)赋予当前的社会科学方法以活力,但是它与注重历史性阐释的方法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在这篇文章中,沃尔克对世界政治分析中的历史学派与结构学派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行了初步概略的探索。在第 17 章《女性主义议题与国际关系》中,琼·贝思克·爱尔希坦将受到人们忽视的本体论因素提到国际关系研究的议程上来。她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对这些本体论因素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并且,将其视为一种强有力的破坏力量,介入到国际关系学有关理性与平等、权力与主权以及暴力与正义的主要争论之中。

第五部分《重新探索》只包括最后一章《重释现实主义》,但是它将现实主义的后结构主义问题再次纳入人们的视野之中。詹姆斯·德·代元教授以当今世界的加速发展(同时性)为分析背景,提出了三种反对传统的方法,恰如其分地分析了各种异类现实主义的学术价值,并展望了现实主义多元发展的前景。因此,这一章不应该被人们看作有关国际关系理论争论的结束,而是这场争论的重新开始。

三、对本书的分析评价及其他

正如德·代元本人所总结的那样:“就这本论文集的目的而言,它并不是要解决某些问题、综合对立的观点或者做到百花齐放

远◇国际关系理论批判◇

(就像实证主义的、辩证的或折中的方法可能推进的那样),而是通过批判性解释的对话形式,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起点以及它的遗产进行重新探索。至于这是否代表了国际关系理论有非中心化、解构的或仅仅是一种非革命化的倾向,那就留给读者来决定”^{〔1〕}。

这本文论文集贯穿着一场有序而又相互对立的辩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德·代元本人具有不列颠学派(月曜杂报)的“元理论”(元理论)的审视立场。在麦基尔大学期间,德·代元就承认,自己从布尔那里了解到,国际关系理论中最重要的对话是在哲学历史方法与行为主义方法论之间、规范性研究与价值观中立的社会科学之间以及怀疑性的批判主义与进步性研究方案之间展开的。在他所写的《导言》中,人们能够清晰地看到现实主义与其继任者之间的对话,而后者探索的是非欧洲的历史(这是不列颠学派的一个主要目标),探索一种更加解放的、不局限于国家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并且关注一种“元理论探索”,用后现代的话语方式解构并重构国际关系理论。在“尾篇”,德·代元借用1945年美国世贸大楼被炸这件恐怖袭击事件,点明了当今世界所具有的“同时性”(同时性)这一典型特征,并指出:“国家是由话语、比喻和意义含糊的概念编织而成的,是一个脆弱的结构”,最后的结论以后现代理论(后现代理论)为基础。在其他文章的体例安排上,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所蕴涵的后结构主义态度,如“存在审美学”(存在审美学),也能发现福柯(云图)、克里斯蒂瓦(云图)和德里达(云图)从“文本”对话的概念以及从“战场”、“武装斗争”的概念中获得隐喻的这些著名结构主义者的影子(如第六章)。也就是说,这本文论文集所表现出来的国际关系研究中语言转型(语言转型)的倾向比较明显,“反常规”和“反权威”的态度十分突出。

这本文论文集剖析的重点是各种形态的现实主义,以此对传统理论的“天然地位”提出挑战。众所周知,古典现实主义在冷战期间

两极对峙这样的困境中得到加强,并且受到学科式经院哲学的提炼,致使整个国际关系这门学科陷入一种“窒息”状态。即使在理论沉闷的时期(20世纪70年代),涌现出了各式各样的新式现实主义,但大多是美国制造的大杂烩,它们拥有的只是进步性、用词过度精练以及微观经济学方法的光环。本书在这方面的特点最突出,德·代元似乎特别喜欢或者擅长在不同的分析框架下比较现实主义的各种“文本”和“现实命题”^{〔1〕}。面对现实主义的描述能力日渐下降的这种历史性挑战,他提出了三种批判性方法:系谱学、符号学和引导学(即谱系学、符号学、引导学),将它们作为理解晚期现代性的后现实主义信标(马基原主义是其基础)。即使在对现实主义(结构学派、历史学派或科学派)的核心概念和传统命题的“再思考”中,本书也囊括了凯勒的“能动的客观性”、哈丁的非洲世界观、麦钱特的生态思维这些女性主义的认识论基础(如第四章),以性别(马基原主义)在实在论(马基原主义)意义上的确切内涵来探求“认同政治”的本质(如第十三章)。其实,本论文集的编排结构非常清晰,它从现实主义的一统性开始,中间引进了与之相关或相对的各种批判性文章,最后以尤利西斯(马基原主义)式的多元现实主义,甚至以异类现实主义(马基原主义)作结,预示着一场更加广阔的学科性争论的到来。

这本论文集较为客观地展示出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轨迹决不是一种线性式的拓展。正如德·代元本人所言:“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该把现实主义批判性多元论方法误认为更具有保卫行动色彩的方法,从而用新的学科禁锢取代现实主义的超哲学形式”^{〔2〕}。例如,温特所提出的建构主义理论就是不同理论范式相互融合的结果,它既有理性主义的认识论角度,也有反思主义的本体论因素。在这些文章中间,虽然主编本人呼吁国际关系学者要摆脱传统方法的桎梏——哲学反思、历史性阐释以及司法调解,使人们集中关注于认同政治(包括伦理的、民族的、性别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认同)、后现代的分析方法、综合性的辩证法等等,但是(新)现实主义仍然占据主流

愿◇国际关系理论批判◇

学派的地位,其研究范式、方法在学科发展中起基础作用,无论其他学派赞成还是反对、修正,此其一。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受制于客观环境的变化,也受制于科学本身所取得的重大进展,既然上述两种因素的发展并非是一种直线性的发展轨迹,那么,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将国际关系学的不同派别视为一种替代式关系,而视为一种相互共生、相互促进的关系。例如,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达成了理论通约,即学术界常说的“新新综合”(~~新新综合~~),此其二。除了现实主义的自身发展之外,其他学派内部的分化趋势日渐加强,纯粹的学派阵营不复出现。比如,女性主义有现代学派与后现代学派之分,建构主义有保守学派、自由学派以及激进学派之分,这也是国际关系理论非线性拓展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此其三。

对本论文集所蕴涵的批判性探索进行客观分析。第一,这本论文集显露出国际关系学的“美国化”(~~美国化~~)。所谓“美国化”,首先表现在对确定性的追求(以科学化为目的),实证主义成为有效的学科“工具箱”。也就是说,该学科将经验主义研究与建立前提并加以验证的做法相结合,注重国际关系学的“精密性”(~~精密性~~)。其次,关于现状的研究占据学科研究的统治地位。国内政治与国际事务之间的关系、国际等级制的实质等问题是学者们剖析或修正的重心,而且学界与政界的联系较为特殊,如“基辛格症候”(~~基辛格症候~~)。最后,深层次的“美国话语霸权体系”主导着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脉络,无论是权力、主权、国家等核心概念的提出,还是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进行类比等经典命题的论证,充斥其中的大部分都是美国式声音。就学科的国别特色而言,这本论文集实际上就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不列颠学派和北美学派之间的直接对话,它们所代表的基本上都是西方“优势”理论的传统。在这些文章中间,我们可以看到马丁·怀特与汉斯·摩根索、汉迪·布尔与理查德·阿什利、罗布·沃尔克与罗伯特·基欧汉之间的争论。例如,在理论的逻辑起点上,怀特对他所称作的“主权国家所强加的理性偏

见”表示反对,并坚持认为,国际社会是在文化的框架下运作的;摩根索以无政府状态的必然性(作为假定)来探讨国家间关系。再如,罗布·沃尔克对基欧汉提出的方法论问题进行回应,并且认为,虽然永久性(霸权主义)结构主义(特别是国际制度论和结构现实主义)赋予当前的社会科学方法以活力,但是它与注重历史性阐释的方法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尽管不列颠学派(还有“历史社会学派”、一体化理论)属于西方的主流学派,但是也避免不了受制于“学科美国化”的这种尴尬局面,那更不用说非西方理论“异化、边缘性”的命运了。即使本论文集的主题是“批判性探索”,实现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与融合,但是国际关系学这种多元共生的趋势也仅仅是“美国中心”之下的“否定之否定”。简言之,在这种“一言堂”关照下的理论探索不能不说是本论文集的一大缺失。第二,本书的批判性探索似乎将讨论局限于认识论或者方法论领域之内。

虽然这本论文集的理论性批判所选的视角比较宽泛,但是所选论文大多偏重于方法论层面上的争论,而很少在本体论等原发性因素的分析层面上展开。关于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基欧汉曾做出精彩的说明,他认为,造成不同学派之间诸多差异的原因,远非学者们对自己研究对象的想法不一致,而在于他们的研究方法不一致。在很大程度上,研究方法取决于研究对象是什么(见本书英文版第16页)。实际上,如果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性探索不从发生学的意义上来展开,而在方法论层面上坚持“硬”标准(或程式化),那么很容易陷入一种循环性理论批判——用一种理论来反对另一种理论——的后果。如果我们不能撼动国际关系理论中“内核”,仅仅在接受诸多假定的逻辑起点上进行一些技术性修正,而无论这些修正是定性还是定量研究,也无论是规范性还是经验性研究,都不能真正达到创建理论的目的。简言之,尽管这种批判对旧理论“破”的倾向非常明显,却很难让人看到新理论“立”的曙光。

总起来说,德·代元主编的这本论文集的视野相当宽泛,几乎涵

100 ◇ 国际关系理论批判 ◇

盖了国际关系这门学科的所有“问题领域”(参见附录B)。通过对国际关系主流学派的“既定前提”和“基本理论”进行再次探索,这本论文集折射出传统方法所具有的狭隘性、经典命题所存在的僵化性。更为重要的是,它向人们明显展示了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已经开始多元拓展的漫漫长路(参见附录B)。简言之,“只有当权威的声音同其他格格不入的声音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国际关系理论才有可能取得进展”(1)。

四、译者的心得:学会多视角地研究问题

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评价标准

德·代元将怀特和摩根索两篇经典文章放在一起,使译者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建立国际关系理论有无可能性这个问题上,怀特得出了较为悲观的结论,相对而言,摩根索则显得更为乐观。为什么对同一问题会出现如此反差强烈的答案呢?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两人对理论的评价有不同标准。怀特坚持国际关系理论的高标准,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必须具备哲学反思的高度,而不是一种历史性阐释或仅仅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在摩根索看来,虽然严格意义上的自主性国际关系理论并不存在,但是从国际关系理论所具有的两种功用来看,已经存在着具有一定标准的国际关系理论。非常巧合的是,他们两人分别堪称国际关系学中不列颠学派和美国学派的代表。众所周知,不列颠学派具有浓厚的欧洲大陆历史哲学的功底,它们注重国家间“关系”(在这种“关系”的下面是文化的认知、历史的反思),对所谓的国际关系“科学”不感兴趣。美国学派则具有特别强烈的功用主义色彩,讲究国际关系学不同于国内政治学的“政治性”,将理论作为指导现实的一种分析性、批判性工具。例如,沃尔兹为了使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不确定行为变得清楚易懂,他致力于发展高度简约(参见附录B)、呈现高度科学化的体系理论,甚至将均势论视

为(自己的理论出现以前)最主要的国际关系“理论”^(缘)。

由此,译者联想到在中国有关国际关系研究的几个评价问题。第一,对中国有无国际关系理论这一问题,学者们的看法不尽相同。中国社科院欧洲所的陈乐民研究员(曾出版《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一书)对我国当前国际关系研究的“杂品”做法提出了质疑,认为从高标准的学科要求来看——理论不是对现实的归纳、演绎,中国并没有形成国际关系理论。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的资中筠研究员认为,从国家间关系的研究现状来说,中国已经具有了初步规模的理论研究。第二,如果我们的研究存在国际关系理论,那么是否具有中国特色?一种观点坚持国际关系研究的“本土化”,认为从中国自身的文化积累和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指导下,一定能够梳理出不同于“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另一种观点强调理论的本体论和方法论因素,主张理论的特色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即“创新是理论的生命,特色只是理论的存在方式”。也有学者避免使用国际关系理论具有中国特色的提法,认为创建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学派”似乎更为妥当一些。

对比怀特和摩根索两人对有无国际关系理论所产生的分歧,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一些学术争鸣实际上是围绕“假命题”进行的(因为这些命题经常是记录式、描述式以及预测性的),也就是说,我们缺少对“元理论”(理论中的理论)的探求。社会科学取得进步的关键不在于事实积累的多与寡,而在于思想之间的真正交锋。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偏重于国际关系理论对现状的解释能力,关注于理性外交和战略行动的阐释,而忽视了对国际关系思想传统的理解,致使我们的研究面临着一种“缺少常识线索”(蔡邕《琴操》)的尴尬局面。

关于国际关系理论问题的解决

理论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两种因素的结合,一是理论本身的性质及其内涵,二是研究人员所接受的思维训练。

就国际关系理论本身而言,它的逻辑起点是一些核心概念和核心命题的假定(葬皂皂皂皂)。在传统理论中,最重要的核心概念就是“国际社会”,其“客观”存在是国际关系理论化(葬皂皂皂皂)的常量。在英国学派看来,“国际社会”就是一种多层面存在(葬皂皂皂皂),因而,国际关系学应该是具有细微差别的多因素复合体(葬皂皂皂皂),应该关注多学科交叉性(葬皂皂皂皂)。美国学派认为“国际社会”缺少一种绝对的权威,因而有关无政府状态的理论占据国际关系学的大半江山。(葬皂皂)例如,理性主义理论物化了(葬皂皂)无政府性,将其作为自然给定的东西,建构主义则认为无政府性是由国家造就的,将无政府性从物化中解脱出来,还其文化本意。(葬)就其他非主流理论而言,一则它们重新界定了核心概念,例如,女性主义强调国家利益的多维视角,并对权力的两个拉丁术语“控制”(葬皂皂皂)与“权力”(葬皂皂皂)进行区分;二则它们对“无政府状态的既定性”这个核心命题提出了质疑,例如,爱尔兰坦剖析了女性主义者的“和平政治”是一种乌托邦(葬皂皂皂)的表述。

研究人员的思维方式包括:哲学上的思辨、历史性反思(经验性研究)、规范性研究、数理的模拟以及定性分析等等。不同背景(尤以价值判断为主)的学者研究方法不同,就会导致理论形态上的千差万别。我们从雷蒙·阿隆的“历史社会学”和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中可以看到欧洲大陆哲学中分析逻辑的严密性以及怀疑主义,从不列颠学派的“欧洲国际体系”(汤因比称之为欧洲文明,斯宾格勒称之为西方文化)中可以找到文化的底蕴,从北美大陆的“科学运动”中可以发现功用主义的痕迹。

相比之下,我们的国际关系研究在此方面仍需进一步的改进。第一,我们的研究视角不够开阔,容易产生思维惰性。我们在核心术语的细化方面缺乏新颖视角,例如,我们对主权概念的认识大多停留在法理学层面(绝对性、有条件的可分性),而对“话语层面”上的关注不够,疏忽了主权的“弱化”、“融合”(蔡明达强调,合法性以及主

权背后的“人文精神”(人权)关怀。再如,西方的文化认同学派对边疆(~~政治疆界~~)概念中的“软环境因素”(文化的、影响力的)进行挖掘,以此与地理上的疆界(~~政治疆界~~)区分开来,而我们所偏重的多是地缘政治上的概念。第二,我们对传统命题的批判力度不够,难以提出中肯的问题。在对西方学术成果的“扬弃”方面,有一些中国学者往往只是在重复分析中总结其值得借鉴的地方,而忽视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具体问题化”(~~为特定国家利益服务~~)这一客观事实。我们缺乏一种对理论前提的可信度进行质疑的态度,从而影响我们对实质问题的理解,妨碍我们对理论前沿问题的跟踪、把握。同时,我们在经验层面上的论证要远远多于理论层面上的分析、批判,而且理论的批判与个案研究(~~军事外交战略~~)结合得不够密切。简言之,我们的研究多是反映论而不是改革主义,更接近于描述性而不是“治疗性”(~~政策建议~~)。第三,我们注重理论范式之间的差别(~~学派之争~~),而忽视它们之间的趋同(~~趋同现象~~)。我们的思维已经习惯于两分法(~~二元对立~~ : ~~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辩证法/形而上学~~等等),对于概念、命题之间的关联性重视不够。然而,西方一些学术大师却深谙“学理性融会贯通”的技巧,例如,《权力与相互依存》的作者基欧汉和奈两人发展理论的战略是“退两步,进一步”。他们以创建体系理论范式的雄心作为出发点,但其途径却是后退(~~从体系理论~~)转向建立新自由主义的研究纲领,即为了补遗(~~弥补现实主义理论的不足~~)而放弃了互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理念,走的是“中间道路”(~~第三条道路~~)。^①第四,我们的研究方法过于强调正统性,具有“异端色彩”的方法始终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例如,目前在有关国家安全的研究中,我们常常关注于如何描述自变量 ~~因~~ 变量之间的理性模式和因果模式,而没有注意到全球时代下安全问题所具有的外溢现象(~~溢出效应~~)、外部性(~~外部性~~)和规则的例外性。而在西方,鉴于实证方法未能有效地解释类似的安全事件,有人就提出一种“虚幻理论”(~~建构主义理论~~)来理解全球性事件的不规则碎片化的(~~非理性~~)、非物质性的(~~非理性~~)形式。^②

五、致摇摇谢

在译作即将出版之际,谨向以下个人表示由衷的谢忱:

首先,非常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研究员。在紧张的翻译过程中,王老师始终给我以精神上的鼓励,并就语言转换中的一些“盲区”给以悉心指导。在这里,我也要特别感谢外交学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博士生导师秦亚青教授。秦老师是国内较早研究建构主义理论的专家,并精心翻译了《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使译者能够从中汲取有益的知识养分。两位师长朴实严谨的治学风格,高度负责的学科态度,促使学生在学习力中戒浮躁,尽量做得更踏实一些。

感谢本论文集(英文版)的主编德·代元教授对译者的有力帮助。德·代元教授对这本论文集在中国的出版发行特别关注,多次就书中的难点给予及时而又满意的答复,并将其新著《有效战争》(定稿译本)以及相关的论文赠与译者参阅。

感谢我的爱人、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博士生苗红妮多年来为我作出的无私奉献。她不仅是我的同学,也是我的学术同行,使我能够更好地进入研究角色。作为这本译著的第一位读者,她以批评者特有的眼光对译文的初稿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还要感谢关心、支持我的亲人朋友们,他(她)们的帮助是真诚的,是我成长道路中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特别要提及的是,山东飞龙中大药业公司的张进山先生、济南高联学校的周勇先生都给予我以超乎寻常的支持。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有一群非常优秀的国际关系理论青年学者,他们的学术研究氛围开放而具前瞻性,时常使自己得到有用的教益。

◇译者序◇ 缘

这本译作的分工如下:山东师范大学的查玉玺老师负责翻译第四章的内容,苗红妮负责翻译第十三章的内容,其余章节的翻译和全书的校对工作均由我一人负责完成。最后,囿于译者水平所限,书中定有不妥之处,敬请学界同行和细心的读者给予批评、指正,为盼。

秦治来

2004年 10月于中国社会
科学院研究生院

注摇摇释

(员)参见本译著第一章《导言 批判性探索》的结尾部分。

(圆)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第 147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

(猓参见本译著第十四章《重释现实主义》中“现实主义的流派：注重真实，走向形象”的部分。

(源同注释(员)。

[illegible]

(远) 参阅 见老译闻训词里社推荐的文章《阿比西尼亚之独裁者塞拉西内莱

(殉)秦亚青,《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载《美国研究》,1995年第3期,第55-63页。

(愿)罗伯特·基欧汉,《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第1章第1页(译者前言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愿年。

[illegible]

员远◇国际关系理论批判◇

原水城原名原水城原水城，贵松金原普里（列强充篇），宰藻原普里（列强充篇），国田明援

中文版自序

当我写这篇中文版序言的时候,正值(美国)全国上下忙于有关“怨·灵”恐怖分子袭击一周年的纪念活动,这些纪念活动包括:各种纪念性典礼、宗教仪式以及每天 24 小时的电视直播节目。实际上,这是人们应该做的事情,以此人们可以向遇难的亡灵们表示哀悼,给予受伤的幸存者以精神上的安慰,而且这也表明,我们已经认识到,的确需要对此做出进一步的理解。然而,情况似乎是,我们对“怨·灵”之后的世界进行理解的愿望与理解的能力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而且,也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已经对这种差距做出了解释,那就更不用说,传统理论能够消除这种差距了。

如果要消除这种差距,那么在那样一种无法形容的行为与不可想象的后果之间,在过去的恐怖与现在的不安全之间,我们就不仅仅要理解那些仿效过去的演说(纽约市市长布卢姆伯格 月 日 做出了非政治性的选择),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进一步理解“恐怖分子袭击与军事反击循环进行”的观点(主要网络和有线频道做出了各种令人精神麻木的选择)。我们不只是要将可疑的恐怖分子监禁起来,而不必为此举行公众听证会;也不只是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来铲除未来的威胁。我们对国际关系的分析不仅需要更为深刻的历史视角,而且需要进行根本的创新。

正如同“怨·灵”恐怖事件使战争的艺术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一样,我们的理解方式也必须随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怨·灵”恐怖事件之后的世界里,这种情况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加严密、更富有批判